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学部委员与荣誉学部委员文集  
2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经济学部工作室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学部委员与荣誉学部委员文集  
2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经济学部工作室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部委员与荣誉学部委员文集. 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经济学部工作室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96 - 0979 - 8

I. ①学… II. ①中…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772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陈 力 责任编辑: 陈 力 李晓宪

技术编辑: 黄 铄 责任校对: 超 凡

787mm × 1092mm/16 28.75 印张 485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0979 - 8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 目 录

## 学部委员

- 中国人口政策研究 ..... 田雪原 (3)
- 共和国 60 周年感言四则 ..... 刘国光 (33)
- 管理好通胀预期 防范明显通胀的出现 ..... 刘国光 (50)
- 新中国经济增长 60 年曲线的回顾与展望
- 兼论新一轮经济周期 ..... 刘树成 (53)
-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 刘树成 (70)
- 关于金融危机的几个经济学问题思考 ..... 吕 政 (75)
- 国情与企业产权形态 ..... 吕 政 (82)
- 从百年积弱到经济大国的跨越 ..... 张卓元 (89)
- 中国理论经济学 60 年的六大进展 ..... 张卓元 (100)
- 加速“两个转变”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 湖北荆门等地调研的体会 ..... 张晓山 (122)
-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 ..... 张晓山 (132)
- 中国金融发展 60 年
- 基于储蓄与投资关系的探讨 ..... 李 扬 (147)
- 美国经常账户失衡：表现、理论与政策
- 兼驳伯南克“世界储蓄过剩”论 ..... 李 扬 何海峰 (159)
- 学习的心得，探索的反思 ..... 李京文 (179)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 李京文 (195)
- 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 纪念新中国诞辰 60 周年 ..... 杨圣明 (210)
- 消费理论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 ..... 杨圣明 (224)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汪同三 (230)

着力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 ..... 陈佳贵 (237)

我国实现工业化了吗？  
——对 15 个重点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的分析与评价  
..... 陈佳贵 黄群慧 (241)

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周叔莲 (260)

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 周叔莲 (264)

**荣誉学部委员**

“次贷”危机是经济风暴的先兆 ..... 于祖尧 (271)

贪婪导致危机  
——从“次贷”危机透视美国经济 ..... 于祖尧 (281)

转变发展观念 建设生态文明 ..... 王贵宸 (288)

开展生态建设 发展高效绿色农业 ..... 何迺维 (306)

财政防腐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及其基本构成要素浅析  
——兼论财政专职监督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何振一 (3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 60 年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 汪海波 (339)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回顾与前瞻  
——为庆祝国庆 60 周年而作 ..... 汪海波 刘立峰 (363)

《访日归来的思索》  
——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 ..... 吴家骏 (393)

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统一问题的分析 ..... 张守一 (402)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 陈栋生 (411)

西部大开发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 陈栋生 (417)

对 1985 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 ..... 赵人伟 (426)

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读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 ..... 赵人伟 (441)

后 记 ..... (456)

# 学 部 委 员



# 中国人口政策研究

田雪原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既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人口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全国人口由 1949 年的 5.42 亿增加到 13.35 亿（未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增长 1.46 倍，年平均增长 1.51%，增长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为历史上所仅见。然而分开来看，前 30 年与后 30 年有很大差异：1949～1979 年增加 4.33 亿，增长 79.89%，年平均增长 1.98%；1979～2009 年增加 3.60 亿，增长 36.92%，年平均增长 1.05%，增长率比前 30 年降低 0.93 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前 30 年的 0.53。前后两个 30 年人口增长率差异缘何如此之大，固然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作基础，同时人口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是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结果。

## 一、从生殖崇拜到多生多育

中国何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无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是至迟从纪元开始全国人口达到近六千万之众，就已经坐上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交椅，并且一坐就是两千多年。为什么中国能够坐上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并且坐得相当稳固，对后来的人口变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研究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入口处，需要对从生殖崇拜到多生多育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做出梳理和概括。

### 1. 生殖崇拜

纵观人类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由于愚昧无知，对生育现象产生种种顶礼膜拜，特别是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各民族、种族生殖崇拜的形式五花八门，多以对生殖器官和男女性爱描述的绘画、岩刻、雕塑等为主，成为独具一格的生育文化。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类似的生殖崇



拜描述在许多地方陆续被发现。然而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生殖崇拜也有独到之处。据考证，中国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常说“上下五千年”。然而司马贞所著《补三皇本记》，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二几千年，其中不乏关于人口的传说和记述。尽管对三皇的诠释尚存异义，不过在天皇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地皇神农氏发明农种、人皇伏羲氏发明八卦等的认识上，取得相当大的共识。三皇的三项发明同上古人类的活动休戚相关，同人口的变动与发展紧密相联，尤其是伏羲氏的发明。他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并绘制出的八卦图，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一对首尾交合的阴阳鱼，是策动诸多玄机的核心和动力。通过阳一阴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变化无穷，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生殖崇拜内涵。它比起中外其他那些赤裸裸的生殖崇拜来，显得更富有核心、原生和推动性，将含蓄性、深刻性、全面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是由具体升华到抽象更高境界的生殖崇拜。伏羲还发明和约定以傃皮（鹿皮）为信物和证物的婚嫁制度：本氏族子女均拥有自己的一条傃皮，规定子女结婚时均要出示自己的傃皮，双方同时拥有傃皮的本氏族内兄弟姐妹不得结婚，开中国恐怕也是世界上最早优生之先河。这一条规定起到超乎寻常的效果，伏羲氏族子孙体魄日渐强壮起来，为征服其他部落创造了条件。伏羲氏部落的图腾是人面蛇身，该部落从天水出发沿着渭河、黄河向东征讨，灭掉一个部落，就将该部落有代表性的图腾取下一块添加到自己的图腾上，最后征战到河南，将该人面蛇身图腾添加了许多，有的像胡须，有的像腿脚，有的像利爪，看上去似龙的原形，据说这就是龙的传人的由来。

伏羲处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生殖崇拜也逐渐由对女性崇拜转变到对男性的崇拜。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它对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生育甚至整个人口的再生产产生了莫大影响。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绘画、雕刻、雕塑上，而且体现在象形文字上，如“且”由男性生殖器演化而来，“祖”则代表男根的意思，将女性排斥在传宗接代、种的繁衍之外。于是生殖崇拜演化为对男性祖先的奉先行孝，过渡到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和偏爱多生多育的人口政策。

## 2. 多子多福生育观

由原始生殖崇拜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多子多福生育观，得益于其在儒家学说经典中的确立。众所周知，孔子（孔丘，前 551 ~ 前 479）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何谓“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要想“为仁”，就要按照“礼”，即按照君、臣、父、子规范去“克己”行事。“礼”包括生前和死后两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sup>①</sup>孔子不仅看重生前的“事”，还特别看重死后的“葬”和“祭”，这是孔子“孝”的时间概念。而要想“尽孝”，就要不废祖祭、子子孙孙把“香火接力棒”传下去。这在距今2500年前孔子生活的高死亡率时代，只能依赖推行“庶矣哉”<sup>②</sup>人口生育政策去实现。庶，一般解释为众多之意，指庶民百姓。但在宗法制婚姻家庭概念中，庶特指有别于“嫡出”的家庭的旁支，称妾为“庶母”，称妾所生之子为“庶子”。孔子“庶矣哉”人口思想赞美庶众，没有异义。是否为了人口庶众而鼓励纳妾？至少有此含义之嫌。除此之外，孔子立足于广施仁政，主张推行“近者说，远者来”<sup>③</sup>吸纳外来人口的政策，暗合两千多年以后的人口迁移“推一拉”理论，颇值得称道。孔子人口思想比较清晰的脉络，可用下式概括：

#### 仁—礼—孝—庶—仁

这里，“仁”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点，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怎样才能达到和实现“为仁”？只有按“礼”行事。“礼”在家庭和代际关系上，表现为生前和死后的“孝”。要想使“孝”代代相传下去，就要保证“庶”——人口的增加。“庶”是伦理和对内对外施仁政取得的结果，于是从“仁”出发又回到“仁”。

孟子（前372～前289）对孔子人口思想有两处重要的发展，一处是至今尚且耳熟能详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教，将生子传后提到“孝”的首位，视不娶妻和娶妻不生子为最大不孝；另一处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思想，结合战国时期土地大片荒芜实际，通过施仁政吸引“民归”，阐明“人和”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最重要的标志和条件。

春秋战国以下，自西汉至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前206～1840）两千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时段，人口思想更具封建代表性，历经封建社会大小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洗礼和磨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汉武帝（前140～前87）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立儒学为官学，以优礼录用儒生在太学和郡县学校任职，号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儒家学说长期统治中国

① 《论语·为政第二》。

②③ 《论语·子路第十三》。

封建社会的历史。到了宋朝，周敦颐开创理学，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加以发扬光大，用永恒不变的“理”解释万物，君臣父子就成了永远不可改变、通行于历朝历代的“天下之定理”。南宋朱熹（1130～1200）集北宋以来各派理学成果之大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鼓吹“去人欲，顺天理”，树起“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一般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杆，“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封建道德伦理规范，成为具有高压态势的一种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对人口数量、性别结构、教育素质、人口政策取向等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一是将“多子”与“多福”联系起来，明示增加人口的目的性，使之成为广大民众追求家庭人丁兴旺的精神支柱；二是将其纳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给无子无后家庭套上“不孝”的枷锁，形成一种富有威慑力的社会舆论；三是将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渗透到婚姻、生育、家庭、家族、职业、健康、伦理、道德、户籍、统计、天文、地理、税收等诸多领域，策动与土地、田赋、丁税等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形成盘根错节、难以撼动的直接和间接的人口政策，左右着人们的生育行为。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敲响了封建统治历史的丧钟，包括人口在内的传统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的人口思想和相应的人口政策。

### 3. 以多生多育为主线的人口政策

封建时代的人口政策，从内容上划分，多生多育是主线，其他均程度不同地与这一主线相关联。从机制上划分，可分为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和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

（1）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作用于出生、死亡、迁移人口变动，以及同人口变动相关联的婚姻、家庭、劳动、教育、赡养等的人口政策。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主要体现在田赋、丁赋、徭役等政策中与人口有关的部分。

①鼓励多生多育政策。这是历朝历代人口政策的核心和主线，它贯穿于每一个朝代始终，并且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政策之中。如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回到越国卧薪尝胆，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韬光养晦之策。其中“生聚”包括“生”——鼓励人口自然增长和“聚”——吸引外来迁入人口两层含义。规定男女婚龄相当，以利

生育；丈夫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又如汉朝实行奖罚并重的生育政策：在奖的方面，汉高祖曾规定“民产子”免徭役二年<sup>①</sup>，汉章帝降诏免产子者三年人头税，怀孕者奖谷三斛、其夫免一年人头税<sup>②</sup>。在罚的方面，汉惠帝曾下令十五至三十岁女子不嫁“五算”<sup>③</sup>——征收五倍人头税。汉章帝开征人头税先例，通过一定期间的免征刺激人口增殖，收到明显效果。此后历代征收人头税被合法化，而如何征收则成为调节人口增殖的一项政策。直至清康熙时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23年雍正皇帝下令实行“摊丁入亩”，取消按人头征税的制度，迎来封建时期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

②奖励生育男性孩子政策。上面列举的汉朝奖励生育的政策，不是生育就奖，而是“产子”——生育男性孩子才给予奖励。到了南北朝时期，齐明帝降诏：民产子者奖米十斛，“蠲其父母调役一年”<sup>④</sup>，对产子者不仅给予物质奖励，而且增加免除一年的“调役”。唐太宗登极，也下令奖“妇人正月以来生子者粟一斛”<sup>⑤</sup>。一些封建王朝还对产子贫困家庭予以生活补助，元实行一产三子家庭免税三年，明则按例给粮至八岁。到了清朝，则规定“一产三男俱存者，给布十匹，米五石”；“若男女并产及三女，不准行”。<sup>⑥</sup>可见，封建帝王鼓励多生多育的出发点，是多生育男性孩子，女性一般不在其内，人口政策包含很大程度的性别歧视成分。

③提倡早婚早育政策。前面提到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就将女子结婚年龄限定在女子十七岁以前、男子二十岁以前，否则“其父母有罪”。到唐开元二十二年，将允许结婚的年龄下调至男十五岁、女十三岁。<sup>⑦</sup>明朝调整为“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sup>⑧</sup>。

④倡导大家庭政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规模和类型在颇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同鼓励人口增长、多生多育人口政策宗旨相适应，封建社会维系的是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儒家学说在“孝”的旗帜下将“我”的存在泯灭在伦理道德之中，变成“我”仅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汉书·惠帝纪》。

④ 《南史》卷6《梁本纪》。

⑤ 《新唐书》卷2《太宗纪》。

⑥ 萧爽《水宪法录》卷1。

⑦ 王溥《唐会要·婚嫁》。

⑧ 万历《明会典》卷69。

仅是“我”父母的儿子或女儿，把儿女子孙都笼络在父母、祖父母膝下尽孝。封建帝王还出台保护大家庭的政策，如742年唐玄宗降诏：“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现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合，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sup>①</sup> 甚至对“诸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sup>②</sup> 使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联合式大家庭日渐繁盛，家族势力也不断壮大。

⑤禁止弃婴溺婴政策。封建王朝出于增加人口，同时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需要，历朝历代大都制定了禁止弃婴、溺婴和支持官民收养的政策。人口稠密、经济比较发达和弃婴、溺婴比较严重的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江苏、山西等省，地方州县早有一些处罚弃婴、溺婴的条令。宋代以后，南宋曾颁布“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sup>③</sup>；元则制定了“诸生女溺死者，没其家财之半以劳军；首者为奴，即以为良；有司失举者罪之”<sup>④</sup> 的法令；明继承并增加“五家连坐”处罚。南宋理宗时专门设置了官办机构慈幼局，负责收养遗弃婴儿。清朝康熙曾责成“五城司坊官严行禁止，违者照律治罪”，还设置育婴堂，“凡旗民有贫穷不能抚养其子者，许送育婴堂之处，听其抚养”。<sup>⑤</sup> 据《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京师广渠门内育婴堂经营有道，全国普遍推广；江西育婴堂每年收养女婴多则千余口，少者数百口，对保持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

⑥吸引外来移民政策。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鼓励生育的同时，都不放弃通过外来移民途径增加人口，二者相辅相成。在这方面，秦朝商鞅变法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通过“废井田，开阡陌”，招募大量三晋移民前来开垦荒地，规定凡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免除本人的徭役和赋税；而弃农从事工商业或不务正业致贫者，全家罚做官奴。明太祖朱元璋在北方实行“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的政策<sup>⑥</sup>，促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人口回迁。而许多封建王朝推行的戍边屯田政策，以优惠条件吸引内地移民前往，对促进边疆人口增

① 杜佑《通典》卷6《食货》6。

② 《唐律疏议》卷12。

③ 稽璜等《续文献通考》卷12。

④ 元《通制条格》卷4。

⑤ 《大清全典事例》卷1036。

⑥ 《明史·食货志》。

长和边防的巩固，起到很大的作用。

此外，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封建王朝也实行过诸多直接干预的政策。孔子倡导同姓同宗不婚，到483年北魏孝文帝下诏禁止同姓结婚，以下各朝代对同姓结婚的处罚严格起来。唐代曾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缙麻以上以奸论”<sup>①</sup>。明代规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sup>②</sup>。清代除沿袭明朝的规定外，增加同姓结婚“妇女归宗，财礼入官”<sup>③</sup>的条款。与禁止同姓结婚相关联的，是禁止近亲之间的结婚，唐以下各代做了明文规定。同姓不婚和禁止近亲结婚相关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对种的繁衍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功不可没。在提高人口教育素质方面，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推崇儒家经典，使孔孟学说包括后来发展了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深人民众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舆论的、宗教的、宗法的、行政的手段，千方百计维护这一套封建礼教，起到与多生多育人口政策相呼应、相配合的作用。特别是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文举考的是儒家经典，做官做事行的是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及其规范成为衡量人口教育素质的唯一标准，影响至深至远。

(2) 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具有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结合，与各种政策融为一体的特点，因而其作用不可小视。尤其是休养生息政策、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中的相关政策。

①休养生息政策中的相关政策。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迭的历史，基本上是三段论：

初期由乱而治——经过战乱而产生的新的封建王朝，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让步政策，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中期由盛转衰——土地兼并逐渐严重，农民负担加重，社会动荡加剧；晚期由衰至亡——丧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赋税徭役越来越重，国家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战争和农民起义越来越频繁，直至这一代封建王朝覆灭。在这种世代更替过程中，人口也随着呈现有规律性的变动：初期由减少到增加，中期由增加到停滞，晚期由停滞到减少，随着朝廷由盛转衰而增减，总体上呈波浪式缓慢增长态势。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主要在每个朝代的中前期，是实行休养

① 《唐律疏议》卷14。

② 《明会典》卷14。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756。

生息政策的结果；减少主要发生在由衰转亡末期，是封建地主阶级腐败加剧和战乱不断的结果。

秦以后主要朝代的封建帝王，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等，他们本身或为农民起义领袖，或与农民起义关系密切，深知农民为什么要起来推翻原来的封建朝廷，因而在夺取皇位后，一般都要实行程度不同的休养生息政策。以汉朝为例，汉高祖取得政权后，出台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承制定令，在秦法基础上修改成新的法令，保证人民有一个战乱后的安静环境；广招贤士，网罗人才，使人力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轻徭薄赋，实行按粮食产量“十五税一”，开荒耕种头几年免赋，号召战乱流民返回本土从事农耕；军队复员按功劳分给土地房屋，其中关东兵复员留在关中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则免六年等。这些休养生息政策给农民松了绑，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缓解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为人口增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②土地政策中的相关政策。按照封建王朝“盛—衰—亡”三段论模式，一个朝代初期最重要的政策，就是解决前一个朝代衰亡期遗留下来的土地兼并问题。封建统治阶级应对的主要办法，自北魏至宋主要为均田，宋以后则实行土地买卖制度。

485年北魏孝文帝下令，将田分为桑田和露田两种。桑田为“世业”，不得买卖；露田及岁而受，年老则免，身没则还，并且超过部分可以卖，不足部分可以买。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许受田、牛。唐朝效仿魏均田办法，实行租庸调制。624年唐高祖下令：丁男十八以上，给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田少不足其人的“狭乡”，较田多足其人的“宽乡”受田减半；工商“宽乡”减半，“狭乡”不受；对迁移人口的受田，也做了具体规定。受田的丁，每年缴粟二石，称为“租”。依地方出产，或缴绢、绫、缙各二丈，绵二两；或缴布二丈四尺，麻三斤，称为“调”。每年服役二十天，遇闰月加二天，不服役每天折缴绢三尺，称为“庸”。自北魏至唐的均田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特别是新的均田办法多在改朝换代之初发布实施，当时土地荒芜严重，人口减少许多，实行起来比较容易。经过初期由乱而治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兼并逐渐加剧，到了由衰至亡的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到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均田的成果便不复存在了。唐朝租庸调均田制，经过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被彻底冲垮。宋以后，土地买卖规

模越来越大，遂成为一种制度。一方面，土地买卖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强化了这一阶级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可以迁移流动到其他地方从事垦殖或租佃。

无论是均田还是土地买卖制度，都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和增殖。均田制使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有可能在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得到某些土地，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为人口增殖创造条件。土地买卖制度可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另辟蹊径，或到边远地方开荒种田，或成为小工商业者，全社会完成向真正意义自耕农的过渡，完善了建立在个体自耕农基础上的小农家庭。这种小家庭，最能体现多生多育、多子多福的真正含义，是封建时代滋生人口增长的温床。

③税收政策中的相关政策。直接干预人口变动的税收政策前文已有论述，这里说的税收政策，指除直接干预人口变动以外的税收政策，尤其是变法改革形成的新政策。中国历史上的税收政策，汉以前主要是田赋、身役，没有同人口的变动挂起钩来，同人口增长关系并不密切，但是也没有妨碍人口的增长。到了西汉，在征田税的同时开征人头税，无论生子的奖励还是大龄女子不嫁的处罚，都具有人头税性质。汉律将人头税分为7~14岁口赋、15~56岁算赋、20~56岁男丁的力役等不同档次。口赋、算赋的年龄和缴纳的赋税额，不同年代有所变化，不过与田赋比较起来，远比田赋为多，成为主要的税收，直至清康熙、雍正废除人头税改革。人口增加可以不再缴税，其对多生多育、人口增长的作用之大，是其他政策无法比拟的。清朝从康熙到道光150年里人口接连两个倍增，就是最好的证明。

## 二、新中国前30年的人口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人口政策，大体上可以分成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期。前30年的人口政策，既离不开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同人口理论的反复密切相关，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

### 1.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人口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真的是“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好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人民企盼已久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实现了。然而就在这种蓬勃向上、国泰民安、一派祥和的发展气氛中，人口生产正发生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新的人



口问题悄然向我们逼近。

(1) 人口转变。20世纪初,法国学者兰德里(A. Landry)发表《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论文,提出人口的变动可分为原始、中期和现代三个阶段。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 W. Notestein),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分为前工业化、初步工业化、进一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四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以这一理论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建设时期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当处在初步工业化阶段。人口转变表现为高出生率的惯性力在延续,工业化的启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使死亡率有所下降,发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着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统计资料显示,1949~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死亡率于1952年下降到17‰,自然增长率于1951年、1952年上升到20‰的较高水平<sup>①</sup>。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即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展示出新的人口增长态势。

(2) 第一次生育高潮。继三年恢复时期人口转变开始后,接着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生育高潮。1952年全国人口为57482万,1957年增加到64653万,5年时间增加7171万,年平均增加1434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3.79‰<sup>②</sup>,表明“一五”时期已经形成一次相当水平的生育高潮。这次生育高潮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出高出生率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死亡率下降异常迅速,5年中间下降6.2个千分点,年平均下降1.24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创下近24‰的高水平,为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所不多见。

## 2.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建设时期,人口死亡率下降如此之快,人口增长率上升如此之高,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注意。一些专家、学者格外关注,撰写并发表文章,遂引发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

(1) 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再起。按照时间顺序,率先提出节育问题的当属邵力子先生。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其后又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有计划地生育孩子”,不赞成以法令或权利限制人工流产和持久性避孕手术,提出修改《婚姻法》,提

<sup>①②</sup> 《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